

995

1815.2

1955

伟 人 百 传

第 八 卷

主编：侯书雄

孙 武
诸 葛 亮
玻 利 瓦 尔
汉 尼 拔
诺 米 尼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孙 武	(1)
时代召唤	(1)
时势英雄	(11)
少年大志	(19)
谋创大业	(27)
潜著兵书	(32)
进呈兵法	(36)
吴宫训战	(42)
登坛拜将	(46)
疲误楚军	(50)
决战柏举	(56)
南伐北征	(63)
功成身退	(70)
诸葛亮	(76)
不幸人生	(76)
卧龙隐逸	(82)
隆中对策	(90)
计定乾坤	(97)
三国鼎立	(105)
蜀中丞相	(113)
征服南中	(119)
挥师汉中	(124)
北伐之战	(130)
养精蓄锐	(139)
创八陈图	(144)

目 录

mu lu

元戎木牛	(149)
泪洒秋原	(154)
玻利瓦尔	(160)
富有的孤儿	(160)
在欧洲成长	(163)
革命开始了	(168)
“解放者”的诞生	(179)
路在何方	(186)
大决战	(195)
奔向秘鲁	(202)
投降吧，西班牙	(207)
自称最蠢	(217)
汉尼拔	(230)
少年大志	(230)
远征意大利	(240)
威震罗马	(247)
壮志未酬	(255)
诺米尼	(264)
非凡少年	(264)
平步青云	(267)
初次出征	(271)
拿破仑随员	(275)
普城会战	(279)
军参谋长	(283)
赶出军部	(289)
听命于人	(293)
喜结良缘	(295)
出任总督	(299)
出生入死	(304)
投奔沙皇	(307)

伟 人 百 传

wei ren bai shuan

战后耻辱·····	(311)
战后殊荣·····	(315)
“颁发”证书·····	(321)
步兵主将·····	(325)
《兵法概论》·····	(330)
巨星殒落·····	(334)

孙 武

时代召唤

在中国思想界的上空，那个妇孺皆知、百家争鸣、群英荟萃、大师迭出的春秋时代，浩瀚灿烂的星河里镶挂着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孙子。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就是他傲然屹立于风云变幻的春秋时代前列，在血与火的搏击中，在智和力的较量里，栉风沐雨，出生入死，呕心沥血，剔精抉微，不但指挥了“春秋第一战”——气势磅礴、千里破楚的宏伟战争，而且还用他那神奇的笔端挥就了一部不朽的兵学巨著《孙子兵法》。从此，孙子就走进了历史，英名与天地同存；《孙子兵法》就拥抱了世界，其光芒与日月同辉。

人们在颂扬孙子、推崇《孙子兵法》的同时，也许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早在 2500 多年之前，会诞生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为什么生活在“丘牛大车”时代的孙子，能够写出一部体系完备、见解深刻、影响深远的兵学巨著，在世界文化史上构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要想破译这个谜面，惟一的方法就是到社会文明渐次演进的长链中去细细解读。时势造英雄，这同样适用于揭示兵圣孙武之所以问世的底蕴。现在，就让我们迈进那幽远深邃的春秋时代，去揭开大家共同期待的谜底吧。

这是一个动荡变革的岁月，也是一个追求超越的社会，更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

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76 年），得名于鲁史《春

秋》。它上起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下至公元前 476 年东周前期，历时近 300 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具体而言，它体现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它的动态性。社会在动态中发展前进，这是历史演变的根本性质，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然而，在特定历史阶段里，这种动态变革的规模、力度有特别强烈的表现，而春秋就属于这样的特定的时期。在它并不太长的近 300 年历史中，王室衰微，五霸迭兴，列国兼并，夷夏融合，公室没落，大夫专权等政治格局此消彼长，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接；田制改革，赋税嬗变，私学勃兴，军队扩增等经济、军事、文化现象粉墨登场，各领风骚，白云苍狗，叫人不胜感喟！春秋历史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过渡性。春秋社会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逐渐递嬗为封建社会的重要过渡时期，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就是它的前脚已跨进了新世纪的门槛，而它的后脚还停留在旧庭院的边缘。换言之，即它的前中期历史更多地体现了西周的时代特征，而在它晚期的地平线上已隐约出现了显示战国社会特色的晨曦。春秋社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复杂多样性。春秋历史总的趋势是旧的礼乐文明的逐渐衰微和新的封建因素的不断增长，但是在具体的诸侯国之间，在中原和周边不同地域之间，其文明的成熟和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显示着多样化的复杂倾向。这种事物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春秋社会大势走向上的错落有致，异彩纷呈，而兵圣孙武正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风云人物。

西周末年，醉生梦死，荒淫无道的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玩了把“骊山烽火戏诸侯”的天大游戏。结果美人是笑了，而周幽王却落得个身首异处，命赴黄泉的悲惨下场。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护卫下被迫挥泪洒别残破的镐京，辗转迁都洛邑。从此，强大的周王朝开始滑向衰落，历史以它坚定不移的步伐迈进了春秋时代。

春秋一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发生剧烈而重大的变化。

俗话说，“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春秋社会大变革的发生有其

深刻的历史原因，然而，其最终的推动力当首推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

在经济上，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逐步推广，牛耕技术的出现，水利灌溉能力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大量荒地被开垦，劳动生产力和耕作水平获得提高，从而使得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组合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先后采取了承认既存现实经济的措施。如齐国“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晋国“作爰田”，改变以往的土地定期分配制度，鲁国推行“初税亩”政策，按占有私有土地的多少收赋税。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使得齐国“甲兵大足”，晋国可以“作州兵”，鲁国可以“作丘甲”，基本达到了增加赋税和加强军事实力的目的。同时，它在客观上适应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致使私有土地迅速扩大，进一步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

经济上的变革带来阶级关系的变化，使部分贵族向新的生产关系代表者方向转化，使处于最底层的劳动者开始摆脱没有人身自由的处境，整个社会处于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动荡之中，与此相一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使得武器装备得到改良，军队的构成有了变化，从而使战争规模逐渐扩大，作战样式发生演变。

在政治上，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有非常精确的概括，即“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具体地说，可以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一事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特点是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冲突与融合。后一阶段，虽也发生了吴、越勃兴，北上争霸等事件，但是，总的说来“尊王攘夷”的旗帜已经黯淡，中原大国争霸已进入了尾声，华夏融合基本完成，各国内部的经济、政治变化越演越烈。政治格局上，曾先后出现“卿大夫专权”和“陪臣执国命”诸现象，学术文化重心下移，从而为战国时期更剧烈变革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

春秋前期，自周平王东迁后，周王控制的土地日趋缩小，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一落千丈。随着王权的沦落，诸侯对天子的朝聘、贡赋大大减少，王室的财政越来越拮据，周王常常不得不放弃天子的尊

严，向诸侯国“求赙”、“求金”、“求车”。经济上对诸侯的仰赖，使其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受诸侯的摆布。天子共主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笼罩在周天子王冠上的神圣光环，其黯淡消逝只是时间问题了。

最先跳出来向周天子权威发起挑战的是郑庄公。此人不仅政治上深富韬略，军事上也是颇有创见。他不被古法所泥，巧妙使用车、步兵，摆下“鱼丽阵”，箭伤周桓王，大破周联军。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宛如明日黄花，一去不再复返，也由此揭开了春秋争霸的帷幕。但是，由于郑国位处四战之地，国土不大，实力有限，郑庄公只能扮演“但开风气不为先”的角色。真正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的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充实军力。尔后联合华夏诸国抵御戎狄的侵犯，“救邢存卫”。同时兵临汉水，挫败南方楚国北进的锋芒，并召开葵丘大会，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原霸主的地位。

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其霸主地位随之丧失。这时，大国争霸的中心遂转为晋、楚两国之间的较量。晋、楚争霸斗争绵延了100多年，其中经历了晋文公的图霸、楚庄王北上争霸和晋悼公复霸等几个重要阶段。在此同时，作为二等大国的齐、秦诸国也不甘寂寞，积极参与其中。

各大国在争霸的同时，也积极向周边“戎狄”部落进行征服活动。秦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晋征服众多的赤狄、白狄部落；齐灭莱夷；楚吞并汉淮流域的小国。同时，有些中原国家还与戎狄互通婚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长期持续不断的争霸斗争，严重地消耗了各大国的实力，而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又使各大国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大国都感到难以为继。而各小国久苦于大国争霸带来的灾难，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喘息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弭兵止武之议鹊起。公元前546年，在宋国向戌的倡导下，十四个诸侯国代表在宋国举行了一次弭兵盟会，以各小国承认晋、楚为共同霸主的方式结束了晋、楚两国军事抗衡的局面，大国争霸战争从此走近了尾声。

历史进入了春秋后期，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诸

侯国内部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当时，各大国的诸侯，均被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拖得疲惫不堪，这样就给各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得以榨取民众的剩余劳动积累财富和损公室利民众的方式收买人心。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渐强大起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角。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期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时已变为“自大夫出”了。

强大起来的卿大夫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互相兼并，进行激烈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晋国的赵、韩、魏，齐国的田氏家族，由于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而最终成为斗争的胜利者，赢得了政权。

以上便是春秋社会的政治大势，在这一大环境下，任何一个军事家和军事思想的产生，都无可选择地要满足和服务于争霸战争的需要，要立足于反映新生社会政治力量的基本立场和用兵宗旨。

在军事上，和春秋云诡波谲的政治生活相辅相成的孪生物便是波澜壮阔、神奇瑰丽的战争景象。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伴随着春秋政治格局错综复杂的演化，春秋社会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呈现出次数频繁、交锋激烈、空间宽广、样式多种的新气象，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占据了春秋社会活动中显著的地位。在春秋 300 年左右的时间里，各种战争此起彼伏，史不绝书。

春秋一代，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是夏、商、西周时期所不能想象和无法比拟的。近 300 年的时间，爆发的战争不下数百次。可谓烽烟迭起，戈戟进击，你砍他杀，血雨腥风。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这些战争榜上比较重要而典型的有：郑庄公克段之战，郑、卫制北之战，郑、卫、宋东门之战，郑抗北戎之战，周、郑繻葛之战，齐、鲁长勺之战，晋假途灭虢之战，宋、楚泓水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晋、齐鞍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吴、越携李之战，吴、越笠泽之战等等。

这些战争就对象和目的而言，可以划分为几个基本类型。华夏族与戎狄各部族间的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诸侯争霸与大国兼并的战

争；周王为挽回失势而征伐诸侯的战争；下层民众为反抗暴政而举行的军事斗争；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宝座的战争；新兴势力向旧势力夺权的斗争等等。其中，诸侯争霸与大国兼并战争是当时战争活动的主流。从战争自身所涉及和包含的内容看，当时的战争已经基本包举了古代战争的方方面面，战争的种类已相当齐全，这反映出战争业已高度成熟，这对于军事理论的相应总结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春秋时期的战争，其作战样式和指挥艺术也是前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一般而言，大方阵的车战是当时作战的主要样式。然而自春秋中期起，由于井田制的衰落，“国”“野”畛域的泯灭，原来只能由贵族承担的“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职责，此时，普通的“野”人也参与其中，成为“国之干城”。随着“野”人的大量涌入军队，军队的规模和数量急剧增加，战争的场面也为之改观。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以及与戎狄步兵作战的需要，步兵重新崛起了，步战再次在军事斗争中发挥出强大的威力。这在多山的晋国和南方吴、楚、越诸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水军也渐渐兴起，不再像商、周时代那样单纯地起运输作用，水战在南方地区开始盛行，商代萌芽的单骑，到春秋晚期有了初步发展，这样就更为有力地推动了战争样式的复杂多样。

除了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之外，城池攻守战、要塞争夺战、伏击包围战、奇袭突击战、迂回奔袭战以及诱敌而歼之等战法，也进入了角色，并有所发展。如制北之战中郑军正合奇胜，痛击协助卫国作战的燕师；繻葛之战中郑军集中兵力，攻敌虚隙；晋假道灭虢之战中一石二鸟，兼并对手；长勺之战中鲁军善察战机，后发制人；城濮之战中，晋军退避三舍，击敌先弱后强；崤之战中晋军预设埋伏，大创聚歼；三驾之战中晋军疲弊对手，争取主动；鸡父之战中吴军晦日出兵，出敌不意；柏举之战中吴军迂回奔袭，连续作战；笠泽之战中越军两翼佯攻，中路突破等等，都是春秋战争史上精彩卓越、脍炙人口的篇章。同时，当时的战争指导者也普遍注意将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结合，并重视智谋韬略，利用战略地理环境，强调争取与国，注重灵活用兵布阵，加强军队建设，提倡用间惑敌误敌，从而使当时

的战争不断呈献出新的面貌、新的气象。

当然，春秋社会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并不平衡；与此相适应，春秋时期的战争也可以按其主要特点，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战争受旧军礼的制约和影响，明显带有温和色彩；像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邲之战中，楚军指教晋军如何逃跑；鄢陵之战中晋将却至“免胄而趋风”，向敌国国君致敬，放过郑伯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但是到了春秋晚期，战争活动则更多地打上激烈诡诈的烙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象“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泓水之战中那个大名煊赫的“蠢猪式的人物”宋襄公便是这一转变时期旧军礼的殉葬品。

总之，在春秋期间，战争本身逐渐由崇仁尚礼转变为出奇多诈。概括地说，战争发展到孙武所处的春秋晚期，已经完成了从幼稚到比较成熟的历史运动过程。总的趋势就是，战争的规模日趋扩大，战争的样式日趋复杂，战争的程度日趋激烈，战争的意义日趋明确，战争的结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趋增大。一句话，战争的丰富实践，到了春秋晚期业已为军事理论家系统构筑军事理论体系，指导战争实践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

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剧变，必然反映到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上来，从而引起思想领域的巨大变革。

在西周时期，学术为王室贵族把持和控制，文化乃是这些高官显贵的专利品，普通民众甚至一般的贵族都不具备从事独立学术文化研究的条件的，更遑论著书立说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学说了。这就是“学在官府”的文化局面。到了春秋晚期，随着周室衰微，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变革之中，导致了新的文化组合，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吏颠沛流离远走他乡，官府独占的文化典籍流出深宫，散落民间，再加上那些没落的贵族降为平民，也把文化带到民间，官府垄断文化的局面被打破了，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学术下移”现象。孔子曾不无感慨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伴随着官学的衰落，社会上逐渐兴起了由普通贵族或平民中的有识之士创立的私人聚徒讲学之风，他们也开始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

观点，影响着政治生活。学术下移，私学勃兴，造就一批思想家的出现。以老子、孔子、墨子等为代表的道、儒、墨等重要思想流派兴起，他们都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政治理论，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旖旎新篇章。

随着学术下移，私学勃兴，一场伟大而深刻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华夏大地上蓬勃发展，它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并进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推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

春秋时期的思想解放，首先表现为重民轻神思想的勃兴。西周末年，疑天怨天思潮的兴起，为春秋时期进步思想家重民轻天、重民疑神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首先提出了摆正“民”与“神”两者关系位置的问题。当时，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普遍认为在民神关系中，民是主，神是次；民为本，神为末。因此主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重视民众，反对据神意行动：“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这些观点的提出，它基本上否定了“天”“神”的主宰地位，开始真正把“重民”放到了首要的地位。

春秋时期思想解放的第二步工作是当时进步思想家开始从天道观上初步提出了“天人相分”的思想，从而为“重民轻天”、“重民轻神”观念寻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周内史叔兴和郑国的子产。他们鲜明地提出了“吉凶由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进步观点，同“天命观”基本划清了界限。

春秋时期的思想解放，还表现为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在当时，以老子、晏婴、管仲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已开始用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从中探究事物运动的动因和条件。他们对原始的“阴阳”观念、“五行”思想进行了辩证地阐述和发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辩证思维特征的哲学观点。如“中庸”思想，“节度”观念，“和同”认识等等。这是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拓展。

春秋时期的思想解放，更表现为重民尚德、礼法并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的长足进步。在当时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兼并战争的激

烈，更由于天命观的没落和普通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得不少思想家以更现实的态度对君民关系重新进行认识，注重人事、关心民生成为当时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主流，由此而形成了初步的民本政治观念。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同时，由于旧礼制的衰微，有关以法辅礼、礼法并用的思想也有所萌芽，大大地丰富了统治者的政治统治经验。

显而易见，中国古代社会思潮演进到孙子所处的春秋晚期，业已随着社会条件的变迁而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发展、成熟与完善，不可避免地要与人类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总体发展演化相一致。一个时代产生的军事思想，则肯定会打上它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深深烙印。

以上所述，就是孙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的大势。经济政治的激烈变革，战争演进的逻辑轨迹，社会思潮的澎湃浪峰，已经为一代兵圣孙武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创造了必要的契机。孙子是春秋社会的产物，《孙子兵法》迎合了春秋社会的需要！

首先，春秋时期相对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军队人数的增加，军事制度的革新，武器装备的改良，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从而又使得战争规模的扩大、作战方式的演进成为了可能。这一切又呼唤着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军事思想家的降临，并以全新的军事思想来指导新条件下的战争实践活动。

其次，春秋时期连绵不断的争霸战争、新旧势力争权战争、夷夏攻防战争的实践，使军事思想家从事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建树具备了可能性。同时，孙武所生活的春秋社会晚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向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展开斗争。其中在政治领域，战争乃是最重要的斗争方式，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他们急切需要拥有本阶级的军事理论家，为自己提供从事战争的理论指导。因此，孙子的诞生，乃是时代的需要。

再次，春秋晚期官制建设上文武分职的初步萌芽和卿、禄世袭制度的没落，为兵圣孙武一展旷世才华提供了重要机遇。很显然，文武

初步分职为孙武孜孜不倦钻研军事理论、施展军事指挥才能创造了条件；而当时尚贤使能的社会环境，则为他身为普通的云游之士却获得吴王阖闾的赏识，出任将军要职，撰写并进献兵书提供了保证。

最后，春秋时期社会思潮的长足发展，文化氛围的良好改善，使得孙武在研究总结系统军事理论时，能够最大限度地汲取其他思想家的进步理论，从而确保自己的军事理论建树能反映时代进步思潮的特色，使其富有哲学的底蕴和实用的理性。换言之，是春秋社会的文化绿洲，培植了孙武兵学理论这棵参天大树。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春秋是造就天才的社会，呼唤英雄的时代。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孙子是幸运的，他际会风云，得展用武之地，勇敢地响应了时代的呼唤，睿智地承担起光荣的使命，在疆场上纵横捭阖，在竹简上奋笔疾书，立足现实，回溯过去，瞻望未来，原于战争，高于战争，向历史递交了一份光照千秋的答卷——《孙子兵法》。

时势英雄

一代杰出思想家之所以登上历史舞台，既是他际会时代风云的产物，也是他本人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熏陶孕育的逻辑结果。俗话说：“地杰人灵。”齐国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开放，文化特质充满活力，特别是兵学传统悠久博大的国度。孙子生于斯，长于斯，不知不觉间，就从这片富饶肥沃的文化国土里汲取了丰富而充足的营养。可以说，正是齐国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一代兵圣——孙武，就恰如儒家宗师——孔子，只能诞生于周代礼乐文明充分保留的鲁国一样，这是历史的必然。

齐国的始祖是那位无饵钓鱼，愿者上钩的姜太公吕尚，此人文韬武略，曾辅佐周文、武王讨灭商纣，功居群臣之首，被周武王尊称为“师尚父”。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以藩屏国”，吕尚被封于东夷势力强大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东方，国号为齐。

吕尚就国后，在齐地所遇到的局面比较困难。经济上齐地很落后，人口稀少，土地贫瘠：“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政治上极不稳定，东夷族与殷商有着很深的感情，敌视周族，甚至，东夷族的分支莱夷族还以武力阻止吕尚东进建国，而且吕尚又不是周室的同姓，一旦有重大事情不易像鲁国那样得到周室的全力支持。在这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吕尚毫不畏惧，再次施展其超人的智慧，采取了一系列高明有效的措施，来开拓局面，建国安邦。

第一，在民族关系上，对当地东夷、薄姑等族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软化其反抗立场，调合民族关系，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大局，这一点在开国之初，尤为重要。所谓“因其俗，简其礼”，它的实质就是不强制去推行周人的那一套“礼乐文明”，而是因袭、顺应东夷等人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吕尚的这一方针，为后代齐国统治者所遵循。它的长期实施，导致了“人民多归齐”的大好结果。当

然，吕尚对于那些不肯顺从，甚至以武力进行反抗的，则是毫不手软，以牙还牙。比如，对莱夷族的反抗，吕尚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平息，避免引起恶劣的连锁反应。

第二，在经济上，针对齐地经济落后而自身具有某些优势的特点，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大兴工商，改造土壤，植桑养蚕，通渔盐之利。“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这一国策千余年中一直得到了推行，使得齐国富国强兵：“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盐铁论·轻重》）同时，工商经济本身具有开放、进取的特点，这就为齐国文化注重实用、兼容并取特色的形成创造了契机。

第三，在政治上，吕尚主要采取了两条措施。第一条是用人政策，“举贤而尚功”。《汉书·地理志》记载，当年姜太公受封时，周公曾询问他如何治理齐国？太公的回答简单明了：“举贤而尚功。”就是在用人问题上采取不计出身，惟才是举，不重名分，以功为尚的政策。吕尚在齐国采取的这条开放的惟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比较客观公正地选拔了一批人才。这样，就使吕尚把他从西周带过来的人与本地人结合起来，打破了周人与当地人的界限，使他们抛弃前嫌，合作共事，共建家园。既发展了经济，又稳定了人心，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贤者云集，则事业兴旺。吕尚的这一方针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齐国很快兴盛发达起来。而位处泰山南麓鲁国的统治者伯禽奉行“尊尊而亲亲”的用人方针，这是一条闭关自守，任人惟亲的用人政策，使鲁国一直固守疆土，无所作为，夹于齐、楚之间，国力日衰。两相比较，吕尚的用人政策无疑高出一筹。“举贤而尚功”的方针后来也成为齐国的一条基本国策，它的推行，对于齐国开明政治环境的形成，各种学术思想的活跃，自然不无重大的意义。

另一条政策是礼法并用。《汉书·地理志》载：“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这表明在治国方法上，齐国不同于鲁国“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的做法，而是不拘泥于礼教，注重霸道与法术，造成礼法结合，道法一体。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运用教育的手

段，教育民众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以便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祛邪扶正，扬善惩恶，以法令治天下，确保教育的成果，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种重实效、尚时变的开放政治精神，对于思想的开放和兼容，杰出思想家的涌现并展现其才华，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中，齐地的文化以其独特的面貌出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为孙子及兵学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首先，齐国的社会环境铸就了齐地民众的独特资性。这就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齐俗宽缓阔达，而好议论”，使齐民众易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我们知道“攻人以谋不量力，用兵斗智不斗多”，乃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大传统，齐人“足智”尚谋的地域文化传统，对于兵学理论的构建，是一种文化上的推动。孙武长于齐国，这种地域文化精神势必会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另外，齐人“阔达”、“舒缓”这一国民心理，反映到学术上，就具有宽容精神。在与外界接触中，齐人容易接受新观念，新思想，并择善而从，加以必要的改造为己所用，发展丰富自己的主体文化。这一点反映在孙子的身上，就是他迁居吴国以后，同出身楚国贵族、深富韬略的伍子胥过从甚密，切磋学术，从而自己增加了对南方军事文化的理解，扩大了视野。

其次，齐国的社会环境导致齐国学术独具的特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齐国顺应民俗、注重民生、讲求功利、并用礼法的社会大环境，使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国文化具有注重实用和兼容博取的两大特点。齐国的实用之学相当发达，在数学、医学、植物生态学、土壤分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建树，在当时处于领先的地位。如《考工记》的作者是齐人，名医扁鹊也是齐人。这种实用之学的发展，对于兵学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兵学是一门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以现实利害为依据，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孙子强调用兵作战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思想，正是齐国这